

# 从齐国文献看战国时齐国的社会经济

## ——战国齐陶文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sup>\*</sup>

陈家宁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将战国齐陶文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相关制度相互比较印证, 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中记载的关于生产者分工和生产者居处划分的制度, 在齐国陶文等出土文献中都能找到证据。《左传》中记载的齐国官制量器制度及其换算关系, 也被齐陶文等出土实物所证明。出土文献不仅为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证据, 而且还能证明相关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战国; 齐国陶文; 生产; 量器; 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6)03-0086-07

陶文是指钤刻在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在出土古文字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山东陶文无论从出土数量上, 还是从时间跨度上讲, 都是重中之重。如果把山东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也看作广义文字的话, 那它们可以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文字。此外, 山东泗水尹家城等地商代早中期的陶文也有少量出土。而数量更多、研究价值更大的是东周秦汉时代的陶文, 其中又以春秋末至战国时代齐都临淄附近的陶文数量最多。可见齐地制陶业有着悠久的传统, 从新石器时代, 经商周、直到春秋战国, 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 在当地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陶文一般被看作是战国文字的一宗。<sup>①</sup>虽然战国文字的研究开始很早, 但陶文直到1872年才被发现并研究。陈介祺、吴大澂、丁佛言、顾廷龙等人对陶文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解放后, 李学勤、朱德熙、裘锡圭、高明、孙敬明等先生的研究使人们对陶文的认识日趋深入。尤

其是后两位先生, 他们利用齐国陶文资料研究齐都行政区划、齐国制陶业等内容, 成果卓著。董珊先生也对齐国陶文所反映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史载周武王克商后, 封太公望吕尚于营丘, 国号曰齐。齐始建国时, 并不强大, 而且土地碱化, 不宜种植庄稼。太公因地制宜, 吸收并发扬了当地人民的工商业传统, 为齐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桓公时, 管仲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发展了齐国经济, 使齐国日益强大, 并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春秋战国之际, 田氏代齐, 齐国社会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 经济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管子》<sup>②</sup>、《国语》、《左传》等传世文献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些社会经济制度。而齐国陶文中的许多内容, 正可与这些记载相印证。这不仅为我们研究齐国社会经济提供了依据, 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

这里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试通过

<sup>\*</sup> [收稿日期] 2006-07-21

对传世文献和齐国陶文的比较分析,谈谈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关于生产者分工的制度

《管子·小匡》记载: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且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

《小匡》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应各操其业,各居其所,并且子承父业,后代子孙不应改行。这有利于职业分工,并且便于国家对人民的管理。这实际上是当时宗法制社会经济结构特点的遗孑。到了战国时代,虽然社会结构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变化剧烈,但齐国手工业者一般还都保持着家族协作生产的传统。由陶文所见,齐都及其近郊分布的众多小型私营制陶手工作坊,多数都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其成员主要是父子兄弟。父兄将制陶手艺传给子弟,子承父业。

有一种现象最能说明这一点:私营制陶作坊中有称为“城阳邑某”的一类陶文,如:城阳邑楚、城阳邑弗、城阳邑众等。<sup>③</sup>

“城阳邑”是齐都近郊邑名,在临淄大城东北部。<sup>④</sup>最后一字应是制陶者的私名。孙敬明先生通过对钤有这类文字的陶器进行综合考察,发现其存在印文相同、器类不变、但器物形式却明显具有时代差异的现象,而且所差时间长于人的寿命,因此推断“楚、弗、众”等为先辈制陶者的私名,而为后辈所继承,成为世代沿用

的标志,<sup>⑤</sup>类似后世的产品商标。这个推断是可信的。这证明了私营制陶手工业是父子相传的。

《小匡》认为手工业者应“就官府”,即由官府来组织和管理,正所谓“工商食官”<sup>⑥</sup>。自太公时代,齐国便“通商工之业”<sup>⑦</sup>,经春秋直至战国仍然重视发展官营手工业,其中制陶业还十分繁盛。大家熟知的“立事”类陶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如:

1. 陈向立事岁,照左王釜。(《古陶文汇编》3.5)

2. 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故亳(度)区。(《古陶文汇编》3.13)

3. 内郭陈赏三立事,左里故亳(度)豆。(《古陶文汇编》3.37)

“立事”为齐器恒语,屡见于《管子》一书,如:

1.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管子·立政·首事》)

2. 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管子·七法·为兵之数》)

3.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管子·版法》)

“立事”即“临莅政事”,也就是掌职任事。<sup>⑧</sup>“立事岁”又经常在齐国铜器铭文中出现,如:

1. 国差甗:国差(佐)立事岁,弋(之)日<sup>⑨</sup>丁亥,攻(工)币(师)何(?)铸西郭宝甗四乘。(《殷周金文集成》16.10361)

2. 公子土斧壶:公孙窖立事岁,饭耆月,公子土斧乍(作)子中(仲)姜榼之般(盘)壶。(《殷周金文集成》15.9709)

3. 陈璋罍:佳(唯)王五年,郑易(阳)陈得

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臧戈孔。(《殷周金文集成》16.9975)

4. 陈统釜:陈犹立事岁,畿月戊寅,各(格)兹安陵亭(?)。(《殷周金文集成》16.10371)

可见,以“立事岁”纪年是齐国官营陶制或铜制量器铭文的特点,立事者是齐国官营量器的督造。上揭前两器为春秋铜器,立事者分别为“国差”和“公孙窖”。“国差”即“国佐”;“公孙窖”当即“公孙竈”,为齐惠公之孙。二者均为姜齐之臣。后两器的立事者和制器者均为陈姓,乃战国田齐之族人。陈姓督造在齐国官营陶文中也是司空见惯。

## 二、关于生产者居处划分的制度

《管子·小匡》记载:

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

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卒),率(卒)有长;十率(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

这是管子按照“昔者圣王”的治民之法,先将齐君直辖的区域分为“国”和“鄙”两部分:“国”指齐都临淄城及附属郊、野,“鄙”指一般边鄙县邑。<sup>⑩</sup>再“参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和鄙的管辖区域进一步划分成各级行政单位,每级单位都设有长官。“参(三)其国”指将“国”所划分的二十乡分为三部分,齐君帅十一乡(包括士农五乡和工商六乡)、高子和国子各帅五乡。“伍(五)其鄙”指将“鄙”的范围划分为五部分,即“五属”。

另外关于制国,《国语·齐语》也有类似的

记载,不过称二十乡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没有农。朱凤瀚先生认为《小匡》中的“士”指士阶层;而《齐语》中的“士”是指军士,包括士阶层的下层与庶民中的上层,后者的职业身份是农。<sup>⑪</sup>这样看来两者所指基本一致。

临淄故城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组成,据探测证明,小城的时代最早不过战国,应为田齐王室的宫城。<sup>⑫</sup>可见管子当时所制的“国”当以今之大城为中心。据《小匡》所述“国”中各级区域单位的换算关系,可得出如下公式:

$$1 \text{ 国} = 21 \text{ 乡(良人)} = 210 \text{ 连(长)} = 840 \text{ 里(司)} = 8400 \text{ 轨(长)} = 42000 \text{ 家}^{⑬}$$

由这个公式推算,当时临淄城的士、农、工、商四民总共约有 42000 家。二十乡中从事工商职业的有六乡,由此可知,理论上工商业者约有 12000 家,士和农有 30000 家。这虽然不一定是确数,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临淄城各行业从业人士的大致规模。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齐宣王曰:“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sup>⑭</sup>苏秦同齐宣王讲齐都之事,如果信口开河,宣王必定不信,可见他称齐都七万户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战国中期宣王时代齐都有七万户(家),那么《小匡》记齐都当时有四万两千家,从时代差异和发展速度上讲,应大致反映了春秋时代的人口规模。

我们从《小匡》所记还可看出,当时齐都居民中,手工业者所占的比重相当可观,可以推想,其中制陶者的数量也不会少。这也可从出土陶文的情况得到证明:

高明先生指出,临淄城的制陶业涉及十多个乡,五十多个里,数百名制陶工人,“充分说明战国时代齐都临淄乡里制陶业的盛兴景象”。<sup>⑮</sup>他还列举出陶文中隶属关系比较清楚的 9 个乡名,包括:繇(陶)乡、楚郭乡、王卒左乡、丘齐乡、左南郭乡、贮乡、□乡、□郡乡和卢丘

乡。其中繇乡的“繇”字曾宪通先生读为“陶”，<sup>⑥</sup>已成定论。“乡”字陶文作“𡩺”，方浚益、李学勤、郑超、高明等人读为“乡”，<sup>⑦</sup>其说可从。繇乡是临淄城制陶业最发达、陶工最集中的一个乡，因此才被命名为“陶乡”。如：繇乡大陶里怠。（《古陶文汇编》3.73）

已发现的陶器涉及该乡的18个里，包括：大甸里、中甸里、东甸里、南□里、□里、□𡩺里、𡩺里、上𡩺里、𡩺阳邑南里、𡩺阳邑甸里、𡩺阳邑鱼里、𡩺阳邑杨里、𡩺阳邑中里、大𡩺阳邑里、中𡩺阳邑里、东𡩺阳邑里、西𡩺阳邑里和南𡩺阳邑里。

据《小匡》记载，齐都工商之乡共有六个，而从出土陶文来看，临淄范围内仅含有制陶手工业的乡就至少有九个以上。可见从春秋到战国时代，齐都制陶手工业的地理分布、生产规模和从业人数都有了很大发展。其原因至少有如下两点：

1. 随着以铁制农具和耕牛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的广泛使用，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加之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使战国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临淄城等大中城市陶器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2. 临淄本身就具备悠久的制陶手工业传统，市场需求量的提高使得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传统制陶之家由于自身家族人口的繁衍，又不断分化成许多小的陶工家族。有些新的家庭出于市场竞争和自然资源利用等因素的考虑，搬迁到其它乡里，使得那些在《小匡》的规划中本不属于“工商之乡”的乡里也兴起了制陶业。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战国时的乡里数量很可能比春秋时期的数量有所增加。

因此我们推测《小匡》中记载的管子所称春秋时期四民不杂处的格局，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所改变了。

陶文中屡见“𡩺”字，如：王卒左𡩺阳邑里

土。（《古陶文汇编》3.499）

孙敬明先生认为该字应读为“轨长”之“轨”，是一种官职名。<sup>⑧</sup>如此释不误，则可与《小匡》中的“轨”合证。

由于“鄙”的范围广大，人口分散，因此对其划分与“国”有所不同。而且《国语·齐语》的说法与《小匡》也有不同，作：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据《齐语》所述“鄙”内各级单位的换算关系，可得出如下公式：

$$5 \text{ 属(大夫)} = 50 \text{ 县(帅)} = 150 \text{ 乡(帅)} = 1500 \text{ 卒(帅)} = 15000 \text{ 邑(司)} = 450000 \text{ 家}$$

若据《小匡》，则五属所辖居民仅为45000家。同样是“伍其鄙”，《齐语》在“属”和“乡”之间加入了一级“县”，使每“属”所辖居民“家”数变为《小匡》的十倍。我们认为《齐语》的说法更可信，理由如下：

1. 上文提到，“国”中约辖居民42000家。若如《小匡》所述，都城以外广大地区的居民总共只有45000家，就是说在齐君所辖区域中有近一半的居民住在临淄城。这种情况即使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都属罕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域广大的齐国则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逻辑上讲，《齐语》的说法更可信。

2. 《小匡》下文有关于“鄙”之治理的记载：

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

各级区域的顺序从大到小为属、连、乡、卒、邑、家，也是在“属”和“乡”之间多出一级。此处虽然作“连”而不作“县”，但若把它与《齐语》放在一起考察，至少能证明《小匡》上文似有夺文。或应依李零先生补作“三乡〔为连，连

有长,十连]为属,属有帅,五属[各]一大夫”。<sup>⑨</sup>

3.“县”成为一级行政单位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李家浩先生指出,“县”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是所谓“县鄙”之“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郡县”之“县”,“指隶属于国都、大城或郡的一种邑”。<sup>⑩</sup>《齐语》中的“县”应属于后一种。“县”在齐国出土古文字材料中屡有出现,其中见于陶文的有:间<sup>⑪</sup>陈得平陵县廩豆□里。(《古陶文汇编》3.41)

《汉书·地理志》载济南郡所辖十四县中有“东平陵”,据张政烺先生考证,即陶文中所称之“平陵”,<sup>⑫</sup>其地今属山东济南。另外,春秋晚期齐灵公时代的叔尸钟及叔尸钫有铭文曰:“余易(赐)女(汝)釐(莱)都昧髡,其县三百”。李家浩先生认为这是指“昧髡”县中之邑的数量,<sup>⑬</sup>甚确。但他依吴其昌、容庚先生,将“言”读为“二百”,似可商榷。我们以为当依郭沫若及于省吾先生的意见,<sup>⑭</sup>读为“三百”合文。据《齐语》所述,一县正得三百邑,与此相合。

《簠斋古印集》1.15.3号著录一方齐玺,其文曰:“平陵县左廩玺”。又《临淄封泥文字叙目目录》1上著录一件封泥,文曰“甬县”。这些材料都证明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行政单位中有“县”一级,《齐语》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小匡》中的“率”应如李零先生所言,当为“卒”字之讹。<sup>⑮</sup>陶文中的“王卒”应属“齐王的直系部队”,可以经营制陶业,<sup>⑯</sup>与《小匡》中的“卒”无关。

陶文中有“邑”一级行政单位,已见上揭“城阳邑”等例,处于城外,与《小匡》所记相合。

### 三、关于齐国官制量器的制度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晏子曰:“……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

大矣。”<sup>⑰</sup>

据晏子所述,春秋以前齐国姜氏的量器换算制度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1 \text{ 钟} = 10 \text{ 釜} = 40 \text{ 区} = 160 \text{ 豆} = 640 \text{ 升}$$

《左传》杜预注:“登,加也。加一,谓加旧量之一也。”<sup>⑱</sup>即陈氏的新量制是将旧量制中某些级别的进度加一个单位,由原来的四进制变为五进制。《管子·轻重·海王》载管子言“盐百升而釜”。每釜合一百升,而釜到升之间有区和豆两级。可见并不是其间每一级都“登一”,而是仅有其中两级变为了五进制。即:

$$1 \text{ 釜} = 4 \times 5 \times 5 \text{ 升} = 100 \text{ 升}$$

据清代孙诒让的意见,<sup>⑲</sup>新量制的换算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1 \text{ 钟} = 10 \text{ 釜} = 50 \text{ 区} = 250 \text{ 豆} = 1000 \text{ 升}$$

从出土齐量子和子釜、陈纯釜和左官钺的实测数据来看,与这个公式大致相符。<sup>⑳</sup>

而魏成敏等先生经过多方考查,<sup>㉑</sup>则赞同莫枯在《齐量新议》中的意见,认为进制保持不变的应在豆和区之间。从目前的材料看,此说的理由应更充足。因此新量制的换算可表示作:

$$1 \text{ 钟} = 10 \text{ 釜} = 50 \text{ 区} = 200 \text{ 豆} = 1000 \text{ 升}$$

在出土齐国陶文中,豆、区、釜三种量制单位习见,如:

1. 臧都陈得□左里攸毫(度)豆。(《古陶文汇编》3.26)

2. 甘齐陈固南左里攸毫(度)区。(《古陶文汇编》3.28)

3. 陈道立事左釜。(《古陶文汇编》3.6)

1965年在齐都临淄故城内阚家寨发掘出一件陶杯。魏成敏等先生释作“主(王)升”,<sup>㉒</sup>其说可从。由此可知该器计量单位为升,为田齐官府监制的标准器。因此到目前为止,在传世文献记载的齐国量器单位中,除了“钟”之外在出土陶文中都能找到。

根据齐国铜器釜、钺的实际测量,一釜等于

十铢。这样就“使升、铢、釜之间形成了十进位关系,与姜齐旧量的四进位制比较,这种改革显然是一个进步”。<sup>③</sup>

## 四、余 论

由于齐国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自太公以来历代齐君的政策导向,齐国以制陶为代表的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相对于当时其它地区,显得较为先进。《管子·小匡》中所记述的其实是在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这些措施在齐国有很多得以实施,其中一部分还被战国陶文所印证。《左传》中所载齐国量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与出土陶文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如下:

1 《小匡》称“士、农、工、商四民”不杂处,各居其所,是当时社会改革方案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反映了早期齐君根据齐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情况和居民的经济传统来安排居民职业的史实。同时也可证明,在春秋时期四民的居住形式就已经出现了由不杂处向杂处转变的趋势。《小匡》引古代圣王之制,正是为了恢复古制。四民杂处便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是社会经济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小匡》的设想并没有阻止这种趋势。不可否认,到了战国时期,陶乡等制陶传统乡里还继续保持着从业人数多、人口密集等特点,但制陶者的居住地已分散到全城诸多乡里,正说明了上述趋势。

2 《小匡》所记四民职业父子相传的习俗是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特点,也有复古的意味。东周以来的社会变革对这种传统有所打破,其中“士”阶层的分化就表现得很突出。但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制陶为代表的手工业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家族生产的传统模式,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尽相合。官营制陶手工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主要生产标准量器和建筑材料两类。前者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巩固;后者主

要为瓦器,用于城市建设。这都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因此国家必然要征调生产水平较高的陶工,而那些世代守业的熟练陶工就成了首选。同时私营制陶手工业者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也要求较高的工艺水平。由于制陶手工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要想熟练掌握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生产实践,因此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这种职业在家族内部的长久传承。

3 据《小匡》和《齐语》等文献记载,齐都“国”内的行政单位包括乡、连、里、轨、家等级,临淄以外“鄙”中的行政单位包括属、县、乡、卒、邑、轨、家等级。这些单位名称见诸陶文的主要有乡、里、轨、县、邑等,其中“乡”、“里”的出现频率比较高,而且名称数量多。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它们是临淄城中比较实在的行政单位。而“连”、“卒”等则从未在陶文中作为行政单位出现过,因此我们推测它们有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废置,或者也可能它们仅仅是出于《小匡》等书作者的理想,而未在现实中推行过。无论在“国”中还是“鄙”中,“家”都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上揭“城阳邑”类陶文最末的私名,实际上就是制陶手工业家庭的标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小匡》设计的制度,战国时期齐国的实际行政等级已经发生了变化,行政单位的设立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再过多地拘泥于传统或设想了。《齐语》讲“制鄙”时径称“三十家为邑”,而略去“轨”一级,可能也是这种变化的反应。

4 《左传》等文献记载了“齐旧四量”间的换算关系,以及陈氏新量对其进行的改造,虽然不是很明确,但为我们结合出土陶文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量制的变化及换算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不同单位量器的容积具有倍数关系,因此其体积相差较悬殊。据常理,中等体积的量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数量也应该最多;最易存放,因此也应该最易流传下来。事实上,容积稍大的釜、中等的区和稍小的豆也确

实在陶文中极为常见;容积最小的升是极个别的,容积最大的钟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是符合陶量数量实际情况的。

总之,将出土陶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考察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研究当时的史实具有很大帮助,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做更多的努力。

####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 以下“陶文”主要指战国时期的齐国陶文。
- ② 不少学者认为《管子》的内容并非管仲遗著,而是掺杂了后世文人尤其是田齐时期稷下诸学者的言论。我们认为尽管它在成书过程中经过后人不断的增补,但总体上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③ 见孙敬明、李剑、张龙海《临淄齐故城内外新发现的陶文》,《文物》1988年第2期。
- ④ 参见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期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一文后附“齐都近郊官、私重要窑场分布示意图”,《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225页,中华书局,2001年10月。
- ⑤ 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期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
- ⑥ 见《国语·晋语四》。
- ⑦ 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 ⑧ 见《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国差甗“立事”注条,53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
- ⑨ 此字原释“咸”,不确。董珊先生以为当为从“日”的“弋”字,月名,相当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一之日”。其说可从。见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186页注54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 ⑩ 关于“国”和“鄙”的意义有不同观点,这里采用李零先生《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一文中的看法。见《李零自选集》1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 ⑪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54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 ⑫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

- 《考古》1961年第6期。
- ⑬ 括弧内为每级单位的行政长官,下同。
- ⑭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章所记与此略同。
- ⑮ 高明《从临淄陶文看乡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25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
- ⑯ 曾宪通《说繇》,《古文字研究》(第十辑)23页,中华书局,1983年7月。
- ⑰ 见高明《从临淄陶文看乡里制陶业》。
- ⑱ 孙敬明《齐陶新探》,《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226页,中华书局,1986年6月。
- ⑲ 李零《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
- ⑳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1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㉑ 此陶第二字原释为“门外”,张新俊师兄以为当为一字,可释为“间”。其说可从。
- ㉒ 张政烺《“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张政烺文史论集》47页,中华书局,2004年。
- ㉓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
- ㉔ 见周法高等《金文诂林》卷四 226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
- ㉕ 李零《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
- ㉖ 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183页。
- ㉗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晋叔向问‘齐国若何’,晏子对以‘齐德衰,民归田氏’”章所记与此略同。
- ㉘ 见《春秋左传集解》第四册 1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
- ㉙ 孙诒让《左传齐新旧量义》见莫枯《齐量新议》,《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1986年。
- ㉚ 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图80 文物出版社,1984年12月。
- ㉛ 魏成敏、朱玉德《山东临淄新发现的战国齐量》,《考古》1996年第4期。
- ㉜ 同上。
- ㉝ 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图80